

辛亥風雲與近代中國



● 貴州人民出版社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会 编

# 辛亥风云与近代中国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维琼  
封面设计 王才禹  
封面题字 喻育之

## 辛亥风云与近代中国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32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21-02428-6

K·101 定价: 5.80元

辛亥風雲與近代中國

百零五歲辛亥革命老人

翁青之書



## 编者的话

今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本论文集是献给这一划时代纪念日的一份礼物。

1989年，是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10周年，又欣逢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工作进程中的两件大事。研究会和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认为，在辛亥革命80周年来临之际，补行纪念这两件有意义的事，是必要的，遂一致同意由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联合组编辛亥革命史研究专辑作为纪念。我们分别向一贯支持和关心本会、本中心工作的知名学者致送撰文邀请。虽然大家都很忙，但大都在百忙中拨冗命笔，欣然赐稿，这使我们感佩良深。

本纪念专辑所载诸文，多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且绝大多数出自应邀撰稿的著名专家学者之手，其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其他几篇来稿也各有真知灼见，读者自可品味。需要说明的是，个别约稿因本辑篇幅所限，我们作了压缩，其中难免有取舍失当之处，敬请作者宥谅。另外，所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事》，旨在向海内外同仁和读者汇报10年来的工作情况，以获得各位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同志，由于他们的热心支持和帮助，这本纪念专辑才得以及时地奉献给读者。

本书由刘望龄、萧致治、吴剑杰、严昌洪负责组编。

## 目 录

### 编者的话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献辞

.....李 新 (1)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随感

.....陈锡祺 (3)

愤悱·讲画·变力

——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

.....章开沅 (7)

清末留日中国学生反“取缔规则”斗争

.....林增平 (26)

论清末的反满革命思潮.....耿云志 (38)

民国初年的权威主义.....朱宗震 (76)

辛亥革命与妥协.....谢本书 (101)

论光复后的湖南政局.....胡绳武 程为坤 (114)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立宪派的关系

.....朱 英 (155)

四川保路运动前夜的社会状况

.....隗藏涛 王 笛 (173)

|                                         |              |
|-----------------------------------------|--------------|
| 孙中山与武汉·····                             | 萧致治(212)     |
| 蔡锷与护国战争·····                            | 曾业英(228)     |
| 论陈其美·····                               | 陈梅龙(248)     |
| 梁启超在戊戌壬寅期间的西学宣传<br>·····                | 唐文权(274)     |
| 鲁迅早期思想与辛亥前民主革命思潮<br>·····               | 冯祖貽(312)     |
| 南社的酝酿·····                              | 杨天石(334)     |
| 盛宣怀与辛亥革命·····                           | 夏东元 王少普(352) |
| 解放思想 坚持务实                               |              |
|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br>事(1979~1988)····· | 辛 流(369)     |
|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 严昌洪(400)     |

#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成立十周年纪念献辞

---

辛亥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革命。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场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到1949年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

中国这场大革命可以和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媲美，在人类历史上鼎足而三，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法国大革命为封建主义敲响了丧钟，为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向全世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俄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引导人类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迈进；中国大革命扩展了俄国大革命的范围，动摇和瓦解了全世界的殖民体系，增强了全世界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中国大革命是从1905年开始的，1911年（辛亥）年取得了第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政府和约三千年的封建帝制，它所掀起的革命潮流不可阻遏，一直涌到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并引向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对辛亥革命的



意义要作充分的估计，不能因为它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就把它说成完全的失败。试问1949年以前，哪一次革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呢？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也没有取得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才基本上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研究辛亥革命应该扩大视野，应该把它和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全部中国历史联系起来；还应该联系着世界史来进行研究，特别是要和世界各国的革命史作比较研究。

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取得新的突破。谨向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祝贺！

##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成立十周年随感

近年来，各种学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多至不可数计。这是学术繁荣的反映。但听说有不少是徒有其名的，有的甚至成了漫画家的题材。然而，我们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是诸多研究会中办得比较扎实、比较有成效的一个。

10年前，当章开沅、林增平、张磊等一批有心人倡办这个研究会时，我就感到此议“实获我心”，曾在广州的筹备会上表示衷心支持，愿尽微力。我校的林家有、段云章两同志参加了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筹办具体事宜的讨论和成立大会。他们回来与我谈及，与会各位的信心都很足。那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不久，大家对会议的深远意义虽然还不可能有很深的认识，但都感觉到学术界的春天已经来临，可以放手大干研究工作了。本来，我们对各种有意贬低辛亥革命的论点（如所谓研究辛亥革命必须批判资产阶级“高明”、“中心”、“决定”论）十分反

感，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具体问题上都有对辛亥革命史重新研究的必要。此后，大家便纷纷考虑新的研究方向与选题，收集和整理研究资料。在那一年，海外的亲戚帮我购买了一套台北1973年出版的《国父全集》和黄季陆先生主编的《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我和同事们如获至宝，校外同行也争相借阅，以先睹为快。今天，这类书籍在国内已不难找到，在当日却是罕见之物。至今，我仍很难忘记10年前来自海外的研究资料匮乏的情况以及刚刚看到这类资料时的喜悦之情。

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与筹办1979年冬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南五省的同行外，还有其他地区的同志。姚薇元先生不顾高龄，从武汉来赴盛会并提交了论文。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王德昭先生等香港学者及高慕轲（Michael Gasster）等几位外国学者。这次会议准备时间比较仓促，各方面的条件远逊今日，但与会者热情很高。提交的论文即使按今天的标准看，有的也是高水平的力作。会议讨论之热烈，为十几年间所未有（“文革”之前两三年，学术气氛已不甚正常；“文革”结束后，有一段时间仍难畅所欲言）。这次盛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只是姚薇元先生、王德昭先生于几年前先后弃世，再没有机会向他们请教、与他们切磋了，思之令人不胜感伤。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以这次讨论会为起点蓬勃地开展起来了。1981年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把研究推向新高潮。此后，有关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频频举行，专著和论文纷纷出版和发表，专门性的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和扩大，一批青年学者迅速成长。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也越来越有成效，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成了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研究成果、研究队伍和社会影响来看，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这两个密不可分的课题，是当前中国历史学界最繁荣的领域之一，

同时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的兴旺发达，首先是由这个课题本身的意义决定的。以往，有一句话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几乎为辛亥革命的评价定了基调。言下之意，这场革命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就是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何况，这场革命的成果和影响绝不是用“赶跑一个皇帝”所能概括的。几年前，如果我们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振兴中华民族这个角度来评价，它应是本世纪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当前我们为祖国“四化”和统一而奋斗的事业是第二次、第三次腾飞。这是很多辛亥革命研究者以至千千万万人对辛亥革命的共识。现在，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得到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大家都承认，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至无产阶级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建国以后，在国庆节日，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树立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也就是承认这个事实。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应以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志，认为辛亥革命是改变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革命。对这种学术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觉得，这种观点的出现，至少反映了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讨论正在深化中。这样，中外学者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辛亥革命是很自然的事。

与辛亥革命研究密不可分的是孙中山研究。十几年前，我说过孙中山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辛亥革命。有的同志不赞成，认为孙中山一生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晚年实行国共合作、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我和大家一样，对孙中山晚年建立的历史功绩十分重视和崇敬，但我又认为，领导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对民族、对历史的最大贡献。孙中山是这场革命思想上、政治上、组

织上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而这场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大变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孙中山在其他时期对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是很伟大的；在肯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肯定黄兴、章炳麟等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人们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的认识，与对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认识同时加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与活动，一直是孙中山研究的一个重点。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各个单位、各位学者，都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武昌首义之地很自然地成了辛亥革命研究的中心。研究会除了参与组织大型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促进国内外同行的交流联系等工作以外，还出版了《辛亥革命史丛刊》、《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前一种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有影响的刊物，后两种是会内外同行进行交流的内部刊物。对这三种刊物，我是每期必细读，每读必有所获。特别是《辛亥革命史丛刊》所刊载的论文和资料，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对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这是公认的。对这个刊物，武汉的同志付出了更多的辛勤劳动。家有同志前些时与我谈起，《丛刊》的经费很困难，全靠开沅、望龄等同志惨淡经营，才得以坚持出版。平时，我对研究会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事实上也是爱莫能助。但对于为研究会的工作、为学术繁荣而呕心沥血、作出牺牲的同志，不能不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同时，也衷心祝愿这三种刊物能继续办下去，办得更有水平、更有影响，对繁荣中华学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更大的作用。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迎来了自己10岁的生日。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成长，我们这个研究会、我们的刊物一定会更兴旺。

## 愤悻·讲画·变力

### ——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

---

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其主体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当然其间也有积极的乃至进步意义的文化交流，但即令是文化交流，也往往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印记。因此，民族情绪便必然使中国人对于外来冲击的反应常带感情色彩，特别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感情更容易湮没理智。对于被侵略民族的义愤，应该给以历史的理解与尊重；但也应该看到，义愤如果不与理智结合，则又很难把可贵的民心、民气、民力引向正确的道路，甚至会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损失与灾难。考察中国人对外来侵略反应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本文无力作全面论述，仅只就愤悻、讲画、变力三个词语的提出及其内涵，从一个侧面对此试作探索。

—

愤悻与讲画二词出之于魏源。《海国图志叙》借用明臣之言：

“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并且指出：“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又说：“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所承受的第一次侵略战争，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罪行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必然要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义愤。这种义愤可以激发人们奋起反抗外来侵略，但是却并非所有单纯的义愤都可以转化成为民族“违寐而之觉”的精神驱动力。所以，魏源在强调“发愤”与“忧患”之际，特别提出“愤悱”一词。愤悱出于《论语·述而》，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把愤悱与启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感情与理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民族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这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义愤的较高层次。

但是，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达到这样高的认识，他们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义愤，大多仍然停留于情感激动的层次，而且与传统的“夷夏之辨”思路紧密相联系。中华帝国历来以文明古国自傲，而以野蛮的夷狄鄙视外邦，即令时至已渐衰微的清朝中叶，这种荒诞的陈腐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开始打破了他们心目中固有的世界格局与秩序，因而使他们惊呼：“此华洋之变局，亦千古之创局也。”“天地为之震撼，沧海听其横流。燭火争光于曜灵，破獬砺牙于当道。漆室女闻而啜泣，况乃须眉；童汪绮誓以身殉，矧曰壮士？凡有血气者，莫不抚膺浩

叹，指发狂呼。”①《江宁条约》订立以后，这些人固然愤慨于割地、赔款，然而更为痛心的还是外国人“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认为“国体之沦失以此为最”。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春秋》所最重者，冠履之分；所最谨者，华夷之辨。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君子讥其中国诸侯降班失列，下与夷狄大夫会也。今督抚之尊，不止大国诸侯，竟下与犬羊之逆，用平行礼。不特褻渎衣冠，为中外所耻笑，且使各夷闻风效尤，等威莫辨，中国又何恃以为尊乎？……逆夷藐视中国官员，是藐视中国天子。窃恐平行者，争长之阶；争长者，倒悬之渐”②。但是，这些慷慨激昂的悲愤抗议，并未使他们渐趋麻木的中枢神经恢复活力。时人记载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雨之禁。怡（良）奏英夷索还台湾已杀之俘。上曰：‘这个东西，不过又要我找些银子罢了。’盖以其未有大志，唯在图利而已。”③

魏源与这些人不同。尽管他仍然隶属于这个阶级，仍然没有完全超越“华夷之辨”的传统窠臼，但他反对恪守祖制的泥古不化，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鄙薄那些“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的愚昧统治者，嘲笑他们：“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都中吟》）连敌国坐落何地都弄不清楚，还有什么资格议战、议和、议守！

鸦片战争与《江宁条约》在民间激起更大的义愤，东南沿海地区劳苦群众纷纷拿起原始的武器，奋勇反抗并打击外来侵略者。但是，这些反侵略斗争大多由地主士绅领导，而他们的思想也仍然为忠君爱国宗庙社稷之类陈腐说教所束缚。如《三元里等

① 曹中人：《夏燮〈中西纪事〉后序》，转引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813页。

② 沈衍庆：《请罢英夷和议书》，《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1005页。

③ 无名氏：《软尘私议》，《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838页。



乡痛骂鬼子词》说：“向来英夷屡不安分，久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戕害官兵，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且示怀柔。乃尚不知感恩，犹复包藏祸心，深入重地，施放火箭，烧害民居，攻及城池，目无大宪。……是以饱德之义士金助兵粮，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勇数十万，何怕英逆之义律不可剪除？水战陆战兼能，岂怕夷船坚厚？务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片帆回国。”①魏源重视民众的力量，特别是通过三元里之战认识到“义民可用”。他认为：“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②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并不相信这些“义士爷爷”，“每人出钱十文，便足以造船只、修战具，灭尔等（指侵略者）有余矣。”他不仅反对“浪款”，而且也反对“浪战”，反对孟浪地拼命。他只是在“以守为战，以守为款”的前提下肯定“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并非指望依靠群众自发反抗就会出现“诛尽英夷”的奇迹。因为，他深知，从民族的总体来看，人心仍处于“寐患”之中。广东的“义民”、“义勇”并无明确的国家意识，他们的反抗与否多半取决于自己的家园乡里是否直接遭受损害。魏源曾经生动地记述，由于奕山等人率军抵粤后歧视残害当地人民，“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南海义勇甚至因为有人被湘兵诬杀而大举哗变，与湘军相互仇杀。及至英军在广州郊区“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特别是由于英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这才激起三元里一带民众愤起倡义报复③。

因此，魏源谋求人心“违寐而觉”，实即整个民族的觉醒。他

---

①《平夷录》卷3。

②《筹海篇》二，《海国图志》卷1。

③《平夷录》卷7。